

目摇摇录

[员]	一千个春天
摇	摇摇——我的婚姻自述
[圆]	天上人间
[圆]	陈纳德将军与我
[圆]	夫妇之间
[圆]	十年之爱
[圆]	婚事
[圆]	无题
[圆]	一封无法投递的信
[猿]	送春曲
[猿]	墓前——念亡夫
[猿]	二十年祭

一千个春天

——我的婚姻自述

一摇古城春晓

一九四四年。

是昆明初冬常见的那种天气，温暖而晴朗。但对于我，今天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。人力车在古老的圆石子路上摇晃颠簸，它载着我去参加一处记者招待会，我，十九岁的陈香梅，算是一个女记者了。

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奇妙的感觉。

早在童年，我便渴望能够从事写作，念中学时，爱好文艺的倾向又转趋于新闻事业。我当过校刊和大学学报编辑，甫离学校便受到中央通讯社的聘约，派到昆明分社工作。如今，一次记者招待会，将给予我严格的考验。

我出生于北平，在香港长大和受教育，到这中国最西南角落的昆明古城，才只两天，两天里我已见到了许多新奇有趣的事物，这儿有许多年代深远的古老遗迹，木轮马车在拥挤的街道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牧人驱着成群的猪和牛，悠闲的在林荫大道上漫步，几百年前，一批批皇室宫廷的放逐者，建起了许多美丽的建筑。

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纷然杂存，此刻正像两道洪流，在我

身畔向着相反的方向，蠕蠕而动，——光腿赤脚戴毡帽的车夫，拼命的掀按车铃，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在缝隙里穿梭的来往，卡车、小包车、中国的和美国的军车，全都急速的按着喇叭，堆满了木材和其他货物的货车，有的用马拉，有的用人力拖挽。

许多商店播放着锣鼓喧天的地方戏，似正在和街头小贩的叫卖声相抗，这种戏曲很难为西方人欣赏，但这里是中国，到处都弥漫着浓厚的中国气氛，揉和着油腻、烟熏、汗臭、敬神用的檀香木、樟脑木的香雾，以及其他千百种味道。

然而，当时我只是下意识的感触到这些景象，声音，以及气味。我整个的思想都盘桓在我的新工作上，一些轻微的，恐怕不能胜任的惊慌感觉，冲淡了我热切的期望。

是的，像我这个受过天主教教育，而且刚迈出大学校门的大孩子，我是否确有能力报道这种重要的军事新闻？或是有关那位表情严肃的十四航空队司令、陈纳德少将？

“我希望你将陈纳德少将和他的部下们，亲切的予以人性化的姿态出现，”我的主编对我说，“人们都称他‘飞虎’，他有一张倔强的面孔，但他却是仁慈而勇敢的。他曾击毁了很多日本轰炸机，而拯救了万千中国人的生命。我要你采访十四航空队和全队工作人员的新闻，让我们的人民对他们和他们正在做的一切，有所了解，有所赏识。你的英文已够好了，我想你将不致遭受任何困难。”

当时，我热衷的同意了。此刻，我却不敢说我自己有把握。或许这位名震天下的美国将军会感到侮辱，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记载他的历史性活动？或许，他没有时间或耐心来理睬我。

人力车夫的脚步缓慢下来，在两部吉普车中间平放下车

一千个春天

杆。这两部吉普车正停在一幢泥土色的，古老的石头建筑物前。大门上悬挂着一块色泽鲜明的新招牌，明白的指出这里就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。

我把簇新的记者证拿给守门的中国卫兵看，旋即被准许进入，令我顿感兴奋。我深深的吁了一口气，穿过幽暗的走廊，遇到一个手捧公文的美下士。在一间标明“会议室”的房间门前，我停下脚步，我的心在急剧跳动。

在这间空敞的大房间里，环绕着一张长形的疤痕累累的木桌，有六七个中国记者，还有几位外国访员，舒适的斜靠在椅子里：都是男人。那一道道逼射的眼光，充满了诧异、欣羡的神色，略带惊愕，一齐投向我来，嘈杂的低语声缓滞了，有一个人吹起口哨。

“安娜，请进。”

中央通讯社的鲍勃冯，一位瘦长的新闻从业员，也不过是我前天才认识的，离开椅子，面露笑容的走近我：“先生们，这是安娜·陈香梅小姐，我们新来的女记者。你们看，我刚才没有扯谎吧！”

我觉得两颊在发热，同业们都站起来，齐声道出礼貌上的问候语：“您好，陈小姐。”紧接着，却从一位“星条”报记者的嘴里冒出一声愉快的：“喂！安娜！”以往，我也曾与美国人相处过，稔知他们的轻松活泼作风，但是这位同业不拘形迹的晤谈方式，就我个人而言，尚属首次。

“我这儿替你留下一个座位。”鲍勃说。

大家刚坐定后，房间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旋开。

“老板！”鲍勃低声说。

我尽量把我的椅子往后推，想越过这些高大的邻人，看个清楚，但却几乎使我的椅子翻倒。我坐稳后，看见一个瘦削，

满头黑发的美国军官，昂首阔步而入。两颗少将级的银星，在他陈旧的飞行皮夹克肩头闪烁发光。他身后跟着一位中国籍上校，还有两个美国军官，一位上校，一位中校。

他强烈的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因为过去我曾在新闻照片上看到过他，我发现，那些照片只能表现他的若干形貌，而并不能完全传神。他迈着轻快而坚定的大步，走向长桌，在主位上落座。他的脸孔遍布深刻的皱纹，有着一个倔强的下颚，看来强韧而果决，一对深沉的棕色眸子却流露着坚忍的神色。我对他的瞬间印象是：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、力量和勇气，兼有高超的智慧。我带着近于轻微震颤的迷惑，凝望着他。

稍后，我发觉在我之前，别的人对陈纳德也有类似的感应。例如在魁北克举行盟国会议时，邱吉尔第一次看见他，就问他的随从副官道：“那个美国准将是谁？”

副官告诉邱翁，那是“中国的”陈纳德。

“这样的一张面孔！”邱吉尔惊叫道，“这样的一张面孔！感谢上帝。幸亏他在我们这边！”

将军与他的随员们就座后，絮聒不休的记者们也就此寂静无声。

陈纳德将军锐利的目光扫射了一周，然后用着美国南方腔调的男中音，慢吞吞的向我们致意。

“午安，先生们。”他的视线触到我，于是眼角边的皱纹深陷进去，“以及女士！”他补充道。

我微笑示意，将军开始他的谈话。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旨，自然是有关美国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上所担任的主要工作。我发觉所讨论的问题也颇有风趣，只是基于战时保密的关系，直到为时很久后，我才能将这幅完整的画，捧呈于世人之前。当时的大概情况是：

一千个春天

一九四三年开始后的数月中，十四航空队已逐渐扩展其行动范围及战斗力。春天在魁北克举行的三巨头会议里，陈纳德将军提供的扩充中国空军防卫实力的计划，获得全面支持，并击败了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中将的激烈反对。陈纳德将军获有罗斯福总统及邱吉尔首相的全力信任——而且，这个计划正付诸实现。

这个计划需要给中国空军再增加三个战斗大队，三个轰炸大队，以及从印度越过著名的“驼峰”，将每月数额高达四千七百吨的供应物资像潮水般的输送到中国来。而史迪威将军反对陈纳德计划的部分原因则是，一条越过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补给线，势难扩展到达成供应十四航空队补给的需要。然而，时至当日，恰是三巨头会议后的八个月，空中运输指挥部已加速进行其供应品的运送率。结果，飞越驼峰的输送量高达每月一万三千吨。

十四航空队在日见改善的情况下，已从一个空中游击队的身份，转而拥有高度效果的攻击实力。它虽然仍是美国驻海外空军中最小的一支部队，但，它的羽翼却覆盖了最辽阔的地区。

在长江以北，中国的空军健儿们时刻升空，迎接日本人的挑衅，于是大江以南的一片广袤领域，便成为十四航空队的狩猎区。从缅甸之东直趋台湾海峡，从长江以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，十四航空队的炮弹百发百中，喷出火花。

将军谈话时，我有时得摘录笔记。我使自己全神贯注于他正在说的话。我甚至筹思一个聪明的问题，以备继他公开声明完毕后的询问时间提出。但是除了注视及倾听外，我竟做不了什么。他是如此有力的支配着整个会场！绝非那两颗银星给予他这份力量，定然是有种无从解释的气质，那是与生俱来的。

陈将军像磁石般吸引着我们的注意。他热切的眸子直率的望着我们的眼睛，他低沉的音调既不严苛亦不专断，但正传达着他不屈不挠的信念。

如今，我明白了。他是如何能在生命的历程中，艰苦奋斗，而获得像今天这样的地位。这个人，数年前应蒋委员长之邀来到中国，训练年轻的新空军们与日本作战。是这个人，是这个没有官阶的人——他早先已自美国空军退休——从中国返回华盛顿，向美国总统请求，准许一群空军辞去现职组成了美国空军志愿队。他是一群英雄们的尊师及领袖；而这群英雄们在各次战役中，曾以每一架美国飞机的丧失，换取击落十架日本飞机的惊人纪录，一直不懈的在写下他们的战绩，证明陈将军的空中战略及战术的正确观念。他是一位英名远播的外国人，为了他对中国的贡献，许许多多的人将他铭刻心田。

我感到困惑不解，好像刚才鲍勃冯曾称将军为“老板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美国人称呼任何指挥官的方式；但，此际我听到将军被人冠以“老”字，不胜惊讶。他当然不是稚气未脱的那一类人，但也说不上漂亮。坐在驾驶员的座舱里，经历了千百次风吹日晒，这是一张经过磨练的面孔。他的眼睛是属于那种遥远凝视型的，仿佛正将内在与外在的视野，同时盯注于遥远的地平线上；他有着一个对自己的判断力及最后成功具有充分信心的人，所拥有的稳健而坚定的双眸。那张战斗人员的面孔，流露出智慧、果决和敏于理解，完全男性化，出奇的具有吸引力。不，他并不——且将永不——衰老。

记者招待会结束。

“你的笔录并不多，安娜，”我们站起时鲍勃说，“你写稿子时，如果需要帮忙，请来找我。”

“谢谢你，鲍勃。”我感激的回答。我转身离开桌子，吃

了一惊。将军正朝着我迎面走来！

“是陈小姐？”

“是的，将军。”

“何登中校刚才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你的父亲最近有信给我，问及令姊静宜的近况，他并提到我可能不久就会看见他另一位千金。”

静宜是我大姐，大我四岁，在十四航空队当了两年飞行护士，我不知道陈将军是否已经知道，她正在考虑父亲的建议，辞离现职赴美，与父亲团聚。

我不再紧张。我仍然感受到他的力量及磁性，但是我又体味到一点别的东西——他是和善的。我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。

“我真高兴见到你，将军。静宜姊姊曾告诉我不少有关你和十四航空队的事。”

他彬彬有礼的向前低下头来——差不多是一鞠躬。

“假如你不急于赶回去写稿，跟我们一同吃杯茶好吗？”

“我预备写篇特写稿，我有时间的，我很喜欢喝点茶。”

他让开路，于是我走在前面，穿过他刚才进来的门，进入一间较小的房间，有几位美国和中国的军官们正坐在那里。

他们都起立为礼，陈将军一一加以介绍——何登中校，新闻官；金特莱上校，十四航空队的军医；舒伯炎上校，将军的联络官，以及其他几位。

“陈小姐的父亲，我在旧金山时认识的，曾托我照应他的女儿。”将军解释道。

“听来仿佛是件战时最佳任务嘛。”何登中校调侃的说。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，将军脸上也掠过一阵微笑。

我们坐定后，一个知礼的男仆托着一盘茶和蛋糕出现。我很少讲话，只是对军官们提出的问题加以答复。大家对我及我

的工作似乎都颇有兴趣。

“我请陈小姐来吃茶，是为了使她明了，我们是友善可亲的，正如我们有工作能力一样，”陈将军说，“我认为倘若她喜欢我们，她必会为我们写出一些好故事，而且都是事实。”

“我要尽力为之，将军，我十分满意我的工作，而且，我还相当年轻，又是晚辈，新闻从业员似乎无需太拘泥形式，请叫我安娜吧。”

“我想要喊你‘亲爱的安娜’。”何登中校说，于是别的军官们又大笑起来。

我怀着一份涌升的激动之情，离开总部。我年方十九，我的祖国置身于战争中，我的事业正进入起点——而我已结识扬名四海的陈纳德将军！他，恰如我曾想象的，予人以难忘的印象；但，有些事情他也表现了友善和亲切，那是我未曾预期的。

我们首次的晤见恰如晨曦乍现。和那些我所遇见过的任何人相比拟，他是迥然不同的。他，像旭光——充满生命，仿佛霍然间，春天走进了我的心房，吹来了崭新的希望与期待。我意识到他的存在，我不再郁郁不乐，我不再畏惧不安。是时，我虽无从确切感应，但那次的相见竟是我新生命中的黎明。

二 摇姊妹情深

快五点半的时候，夕阳余晖在白色的山巅上抹上一层金黄。我离开了中央通讯社的办公室。

我写完了第一篇新闻稿，一缕奇异的情绪油然而生。

我衷心的希望，我的主编为我交上去的特写稿所表示的赞赏是诚意的。我要我的同胞们了解，陈将军正为中国做些什么，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；他的驾驶员们是多么的勇敢，我们又是多么的幸运，飞虎队在我们急需的时候，挺身而

出帮助我们。

很久以后，将军时常在朋友面前评论，自从我参加采访十四航空队的新闻，中国人民多知道许多十四航空队所做的事，以及他们日日面临且予克服的重大困难。我只有说，为了罗致重大事件及读者感兴趣的材料，如果持之以恒的努力，再加上为工作而具有的热忱，就是新闻采访的成功因素，因之，或许我的新闻采访是成功的。总之，我奋力的工作，而且欣赏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。

办公厅的吉普车停在路边，我请司机送我到姐姐的住所，他揸了一下喇叭，就把车子驶出。

车子开向她的寓所的一条僻静街道，是很短的一段路程。我抵达昆明后，就搬进去与她同住，假如她果真启程赴美，投奔正在旧金山任领事职的父亲，我还打算续租那间寓所，不过，我真渴望她能留在昆明。

直到我往楼上跑着奔向她的房间，我才意识到我是这般兴奋，迫切的要告诉静宜，我和陈将军会面的一切情形。

我跨进起坐间，就使我的意志沮丧。静宜正从衣橱里拿出一堆衣服，望着我微笑。一只褐色的橄榄木制军用箱和好几口衣箱，正敞开着，散放在地毯上，显然是在等待收拾。

“我决定走啦——你看，”她高兴地说，“你要吃点茶吗？喊阿妈去拿。”

“你真的决定了？”

“是的，安娜！我一定要走了。”

我走向大厅，喊仆人送茶来，我的失望是深沉的。几近一年，在桂林上大学时，我一直盼望能与静宜共处。而今，我终于到了昆明，而她却要离去。
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我问，眼睛则盯着她，她正小心翼翼

的折叠一堆高领的、光彩耀眼的织锦缎旗袍。

“就在这几天里。星期四中国航空公司有班机直飞加尔各答，我想早些把行装清理好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。”

我坐在长沙发上，欣赏似的注视着她，她的举止极为优雅，她大部分的教育是在美国受的，我极羡慕她的仪态、美貌和高贵的风采。

阿妈给我们送来清茶，静宜放下整理的工作，走来挨着我身旁坐下。

“晚餐有何计划？”她问。

“我还没有想呢。静宜，我今天会见他啦。”

她刚要举到唇边的茶杯停在半空中，睁得圆圆的大眼，凝望着我：“谁？”

“陈纳德将军。”

“啊！”她说，啜了一口茶，略显风趣的注视我。“他人很好，是不是？”

“他该得到一个比‘好’更恰当的形容词。”

她面露笑容，带着一副大姐姐关切的神态：“譬如说，像什么？”

“啊，像——”我迟疑不决，“也许是，伟大。”

现在，她绽开含有深意的微笑，她将茶杯小心地放在栗木的方咖啡桌上，伸手取了一根香烟，“伟大，嗯？”她不置可否的漫应着。

“我这样想！”我用相当温和的语气向她说，“事实上，我真想不出，当你有机会为这样的人工作时，你为何想离开？”

烟雾从她美丽的嘴角飘逸出来。她从沙发上转过身来，面对着我：“安娜，你说话的口气，好像你爱上了他。”她面现笑容的说。

我猛一震惊：“不要说呆话！我只不过崇敬他，和他为中国所做的事。”我喝了一大口热茶，灼烫了我的舌尖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静宜说，“爹爹也希望你能到加州去，你考虑过这件事吗？”

我果断的摇摇头：“是的，我想过这件事，但是我不想去，我愿留在这儿，为战争稍作贡献。”

我略微踌躇了一下，因为她没开口，就接着说：

“再说，我到底学的是新闻，也被训练成一个女记者。同时很幸运的获得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并被派到一个吸引人的部门——陈纳德将军和十四航空队。如果为了在美国那个不可预知的前途，而骤离此地，对我而言，乃是一桩愚蠢的事，因为在那儿的新闻界中，我需要和当地的美国人竞争。”

静宜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了解，我不责备你，亲爱的，但是你也不要怨我，在战时的昆明与重庆，我毕竟耽过整整两年了。”

她并不含怨尤的口气，但，就她的生活实况而言，我想我是了解的。静宜要有一种转变。美国本身，以及更舒适些的生活方式的诱惑，都是她全然稔知的，这种力量自然是强烈的。一股突然涌现的热爱使我面现喜色的望着她，我的思维不期而然的回溯到童年时代。在北平，在我外祖父深大的宅院里，我们一起打发掉早年的岁月。静宜比我大四岁，自然的握有大孩子的统治权，而她也曾充分的加以发挥。可喜的是，她这种态度随着我们年龄的日增，早已消失殆尽。但，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，我，生来是一个自尊心强烈的女孩子，逢到静宜要强迫我照她意思做的时候，我就会大哭。我的双亲在古巴夏湾那结合，稍后，移居华盛顿，在那儿，静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诞生，静宜一直是父亲的宠儿，至今他仍唤她“贝

贝”。而我，对他容或是一种失望，因为继静宜之后，他想一个儿子，可是来临的却是我。然而，这还仅只是开始而已。两年后，香莲随之问世，在连续的数年中，香兰和香竹相继诞生。再往后，香桃小我十岁，来到人间。拥有六千金以后，父亲放弃了他的希望——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陈家有的是六千金！

在中国，大家庭的族人们一起生活，是自行选择的，并非有所规定，所以在北平外祖父的宅邸里，除了外祖父母及他们的一帮仆人以外，我的双亲也寄居在那里，静宜和我，还有我们在襁褓中的小妹妹香莲。

在北平时，静宜同时拥有一名保姆和一位姨娘，而我，因为小一点，便只有一个姨娘。恰如孩子们的想法，我鲜明的意识到，我们之间地位的悬殊。但日趋成熟所培育出一份温情，弥补了童年时的嫉妒。

一个人早年的记忆容或不是最完整的，却常是最浓郁的，最生动的。我在当时的首都——北平的一段孩提时光，明显的刻划成一连串明澈的、永生难忘的印象。外祖父便是其中的一个鲜明印证。

他是一个身材高大，具有威仪的人，腰背挺直，白发皤皤，双目炯炯。在我们孩子的眼里，他永远是伟大，肃穆，甚至穿着睡衣时也是一样——大人物的一切总是不会差的。

外祖父是当时少数高级官员中，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士之一。时值国父早期革命，他留学英、法，满清的军机大臣李鸿章曾经请他伴随访问欧洲及美国。

在外祖父居留美国期间，他爱上并娶了华盛顿城的一个华裔女孩子。他带她返回中国，把她安居在北平城的高级住宅区。当他孜孜于权势的扩展之际，发觉自己同时孕育了一个庞

大的家庭。

他这幢巨大、灰石头的房子坐落在东总布胡同十六号，是这条街上最大的房子，就其巨大与华美而言，“大厦”一词当之无愧。每星期有三四个夜晚有着盛大的宴会，长列的汽车，马车以及人力车排满在大门前，底层的灯光辉煌灿烂。

每当外祖父宴客时，静宜和我及一批保姆娘姨就被驱逐到我们三楼的房间，保姆们把我们安排妥当，就跑到隔壁继续她们无休止的闲谈。于是，静宜和我乘机偷偷下床，裹着毛毯，沿着弯曲的大理石梯栏向下滑行，直到我们能窥见大厅及客厅里的宾客为止。在冬天的晚上，大理石梯阶是冷冰的，有一次静宜一而再的抢去我身上的小红毯，引起我大声哭闹，而提前结束窥伺，母亲匆匆奔上楼来，大家都挨了骂，我们又被送上床去。

在外祖父丛书林立的书房中，每个清晨，他独自翻阅当天的报纸，只有他和他的男仆老冯有这间书房的钥匙，为要找藉口进去，我常自愿送报纸，于是外祖父稍事浏览大字标题，就停下来，专心一意的倾听我稚气的话。在无数个大清早，我们这两颗寂寞的灵魂，他，年事最高的，我，最小的孩子（除去襁褓中的香莲），常常相对唧唧而言。家里其余人通常都起床很迟。外祖父家里的排场包括一辆福特小轿车，一辆双轡马车，还有四部人力车。我最钟爱马车，在我的感觉里，汽车和人力车都跑得太快，我不欣赏。星期天外祖父外出坐车兜风时，总是携我同游，我总欣然接受，对于那些我们共处的辰光，我们都极感愉悦。至今，我依然深信，在孙辈中，我曾得到他最深的宠爱，对大多数人，他是矜持的，保守的，唯独我例外。他知道，我崇敬他。

他癖爱上品的国画及古董，因此每逢星期日必涉足天坛，

徜徉于古玩店中，之后再浏览书店。他学识渊博，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。他所以星期天能上街，是因为中国不像美国，所有的商店除了每年例行的假日，星期天照常营业。

一生中，我回忆到与外祖父的早年关系，是一种极特殊的，极强韧的，极深刻的。一如多少有钱和有势的人，他有时不自禁的感到一些落寞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以我天真、无知的稚子之情，不能说出太多的问题，却能给予他一份纯真的安慰和挚爱；一个无邪的小女孩以她无所疑虑的崇拜的情操，来爱着他。

我另一个栩栩如生，色彩鲜明的童年记忆，就是我年轻美丽的母亲。在北平，我们的大厦里，以及后来父亲担任外交官，在海外的寓所，她都照射出熠亮的光辉。每次，我忆起母亲，就想到一块多棱的钻石，为了她明亮的个性，容有许多光采四射的小平面。但，一颗钻石该是坚硬无比的，而她却绝不是。她有水仙花的清新，柔和；就我而言，她具有一个“淑女”所应具有的一切。

母亲及她的妹妹爱琳在灿烂辉煌的环境中长大。她们少女时住在大洋房里，地上铺着厚厚的中国地毯，天花板上挂着水晶的枝形吊灯，贵重的瓷制的、翡翠的、象牙的中国艺术品摆设玻璃柜子里。家人们都要穿着整齐用餐，每年赴欧洲旅行，并且在修养及语言两方面，注意他们儿女所接受的教育，囊括东西两方的气质与特色。两个女孩都念完法国学校，再赴意大利习音乐及美术。她们返回中国时，博得了北平两个最美丽佳人的盛誉。

两姊妹都是有造诣的语言学家，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德文及日文都说得和中文一般流畅。两人都有音乐天才，我很爱听爱琳阿姨唱歌，母亲在旁伴奏。她们俩在一起

时看来真可爱。

像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弟，特别是在仆从如云的家庭里，我在孩提时代，实在很少见到母亲，她的社交活动频繁，虽然我知道她很爱我们儿女，却少有时间与我们共处。住在外祖父家的几年时光中，我的妹妹香莲因为小我两岁，不成游伴，而静宜大我四岁，已经入学。因此，我大部分的时光是孤单独处，陪我的的是一个娘姨和满屋子的玩具。

当静宜或娘姨惹我生气时，我就奔向外祖父，他是我主要的安慰者，我难得找到母亲在家，他会擦干我的泪水，对我说：“你是最漂亮的，不要哭，我的小宝宝。”接着，他为我讲一个故事，或讲一段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或美国时的有趣经历，有时我躺在他怀里睡着了，娘姨就过来抱我送上床。

我必然是一个意识相当浓厚的小叛徒，因为我极其反对静宜控制我的企图，我不服从她，她总是说：“我要告诉爹爹！”我知道爹爹会站在她那边的。有时，绝望之余，没有办法，我会顶上一句：“我告诉妈妈！”静宜就反击我：“你看不到她。”这是真的。母亲难得在午夜前就寝和早上起床吃早餐。在我看来，她似乎总是忙着上街购物，参加宴会，或是在家中宴客。直到我年纪稍长后，才开始真正认识她，可惜那竟是她死前的几年。

然而从我自己以及得自外祖父的感觉与印象，我一生都爱她，并且尊重她。静宜及妹妹们长大后，反映了具有突出的美色及才干的淑女肖像。

我的母亲认为，女人应时时刻刻表现得温文尔雅和风度雍容。一次，我不客气的讲到我可怜的表姊，母亲就对我说：“一个好女孩该是和蔼的。”她还说了些别的话，提醒她的女儿，一个人的出身，或是她的成就并不足凭藉——可资凭藉的

是她所针对的方向，以及她是否已觅得人生的正确路途。当时我并不全然懂得这些话，可是在她离开人间后，我常常思及她的睿语。

母亲的许多朋友都称她 ~~陈香梅~~ 但在外祖父面前，她是“珍”，除了外祖父，母亲不许别人叫她这个名字，凡外祖父钟爱的人，他都有匿名——直到他临死的一天，我依然是他的“宝宝”。

母亲的外表一向露出愉悦的样子，可是我有一种感觉，她并不总是快乐的。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缠绕着她，致使她的微笑也沾有些淡淡忧愁，中国有句俗语说：“自古红颜多薄命。”在母亲及爱琳阿姨两人身上，这句话太应验了。阿姨三十二岁就故世，母亲死时四十五岁。

父亲与母亲不同，他是自己奋力向上求得成功的。他的父亲——我的祖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拥有中国商船公司。可是由于一连串的噩运，他在投资失败中，丧失了金钱和自信，于是在三十七岁就走上自杀之路，留下一个妻子，两个姨太太，及三个儿子。祖母变卖首饰维持家庭，又将三个儿子送到英国求学，祖父死时父亲年仅十三岁，过着与贫穷搏斗的生活，没有闲暇或金钱享受优渥的生活。

正与母亲极爱交际、宴会、作乐的生活方式相反，父亲属于好学的典型。他喜欢在漫长的夜晚，静静的读书，他在牛津大学法学院毕业，毕业后在大学教授法律，却从不想执行律师业务，他在大学也讲授过英文，却主张他的孩子们研究自然科学。

我认为双亲两人中，父亲与人生接触的关系，胜似母亲所能达成的。他骄傲于美丽的妻子，贯注于工作及书籍，获致了若非绝对的幸福，亦是无比的满足。但一个真实的，有福气的